

宋代以降的《韩诗》研究

吕冠南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由西汉学者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曾经在汉代《诗经》学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除了《韩诗外传》传世至今,该学派其他著作均亡佚于宋代。而学术界对《韩诗》学派的研究也在宋代开辟了新的起点。宋代产生了《韩诗外传》的首部刻本以及《韩诗》佚著的首部辑本。元明两代的《韩诗》研究主要体现在《韩诗外传》方面。清代则在《韩诗外传》与《韩诗》佚著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进入现当代,《韩诗》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所突破。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未来的《韩诗》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专文介绍。

[关键词] 《韩诗》;《韩诗外传》;学术史;辑佚;《诗经》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8)05-0069-07

《韩诗》学派创辟于汉代,“列于学官”^{[1]2916},“行于东汉”^[2],卒消亡于宋代。汉宋之间的《韩诗》研究尚能维持较明确的“连续性”,此后则深陷“断裂状态”^①,渐变为梁启超(1873—1929)所说的“窄而深”的学术^[3],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兹对宋代以降的《韩诗》研究进行综述,以回顾这门学问进入“断裂状态”后所走过的历程。

一、宋代的《韩诗》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三家诗拾遗》曾考察了《韩诗》著作的亡佚时间,并对辑佚情况作了简述:

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也。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摭拾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于咸淳之末,始掇拾残剩,辑为《诗考》三卷。^[4]

政和(1111—1117)为北宋末期徽宗年号,建炎(1127—1130)为南宋早期高宗年号,四库馆臣以《韩诗》“亡于政和、建炎间”,意指其著作亡佚于两宋之交,刘安世(1048—1125)与晁说之(1059—1129)恰好活动于这一阶段。这一事件标志着《韩诗》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除了《韩诗外传》尚可寓目,其他著作已均告消亡。《韩诗》研究

也由著作的存佚状况,分化为两个类别:传世的《韩诗外传》研究及亡佚的《韩诗》佚著研究。

就《韩诗外传》而言,最值得重视的是北宋出现了该书的第一部刻本,洪迈(1123—1202)记之甚详:“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5]“庆历中”略嫌宽泛,屈守元(1913—2001)结合文彦博(1006—1097)仕履,考出李用章刊刻《外传》当在庆历七至八年(1047—1048),因此时彦博始拜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可称“文相公”。^[6]此说可从。洪迈所记庆历本《韩诗外传》,是目前文献所记最早的一部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一语足以证明《韩诗外传》在刊刻之前已得到文彦博的校正,这大概是史文所记最早对《韩诗外传》进行校勘的学者。惜此本今已不存,无从领略其遗貌。庆历之后,最集中地引用《韩诗外传》的宋代学者当属王应麟,其《诗考》从《韩诗外传》中辑录了多则异于《毛诗》的经文,不知其所据之本与庆历本是否存在渊源关系。但该问题在此处无关紧要,最应注意的是王应麟使用的《韩诗外传》较为忠实地保留了《韩诗外传》引《诗》的原貌,而不像后世刻本(如毛晋汲古阁本)那样以《毛诗》为据,篡改《外传》所引《韩诗》经文。清人胡赓善言:“韩与毛异文,据《经典释文》纪载,殆几百数。

[收稿日期] 2018-05-17

[作者简介] 吕冠南(1989—),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秦汉文献与文学。

后觀《诗考》所引,著在《外传》者,亦不下四十余事。第版刻流传,妄疑其误,展转改易,并从《毛诗》。”^[7]实际已将《诗考》所引《韩诗外传》的文献价值和盘托出。

就《韩诗》佚著而言,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出现了这些佚著的第一部辑本,即王应麟所撰《诗考》。《诗考》虽以辑录三家《诗》为悬鹄,但主要成绩却体现在《韩诗》辑录方面,寥寥数条《鲁诗》《齐诗》,仅为《韩诗》之附庸。这一格局的形成,源于主客观原因的夹辅——“韩最后亡,唐以来注书之家引其说者多也”^{[8]35},为王应麟辑录《韩诗》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文公(朱熹)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9],则为王应麟辑录《韩诗》提供了主观上的动力。自此以后,《韩诗》佚著研究便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基础文本,从而摆脱了文献不足征的困境。虽然《诗考》还存在若干漏辑、误辑的情形,以至引发清儒蔚成风气的订补活动^[10],但其作为《韩诗》辑佚的大辘轳,却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对此,四库馆臣有一段相当客观的评价:“古书散佚,蒐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筌路褴褛,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8]35}此外,两宋之交董道(1068?—1138)^②所撰《广川诗故》虽非《韩诗》辑佚之作,但据吴国武统计,此书“直接引用《韩诗》24处”^{[11]197},且“至少有7处仅见于董氏《广川诗故》”^③^{[11]197},吕祖谦(1137—1181)《吕氏家塾读诗记》与朱熹《诗集传》均对此书有所参考。

很明显,无论文彦博、李用章对《韩诗外传》的校正与刊刻,还是董道、王应麟对《韩诗》佚著的引用与辑录,都为《韩诗》研究带来了开创性的成果,宋代也因此而成为《韩诗》研究中生面别开的转捩点。总体而言,宋人研究《韩诗》的成果着重表现在校勘、辑佚等文献学方面,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

二、元明的《韩诗》研究

元明两朝的《韩诗》研究着力于《韩诗外传》方面。

这首先表现在《韩诗外传》刻本的多元化。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路学所刻《韩诗外传》

是现存最早的《外传》刻本,此书因保留《外传》之原貌较为充分,故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黄丕烈(1763—1825)曾对袁廷桢(1764—1810)所藏元刻本(今藏北京图书馆)进行校勘,一语道破其价值:“元本实有佳处,韩与毛之异同,班班可考,后刻反据毛而改韩。”^[12]明代亦有不少出色的《外传》刻本,最著名的为以下三种:苏献可嘉靖十四年(1535)所刻通津草堂本,薛来嘉靖十八年(1539)所刻芙蓉泉书屋本,沈与文嘉靖间所刻野竹斋本。这些刻本或保留了重要的《韩诗》异文,或对《外传》文本进行了精心的校勘,寓研究于校刻,体现出对宋人校勘之学的延续。

其次,明代出现了不少《韩诗外传》评点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刘毓庆先生曾指出明代《诗经》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这个时代第一次用艺术心态面对这部圣人的经典,把它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畴”^[13],这同样适用于明人对《外传》的评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共著录明人评点本《韩诗外传》四种,分别是茅坤(1512—1601)《鹿门茅先生批评韩诗外传》十卷、余寅(1519—1595)评《韩诗外传》十卷、鍾惺(1574—1624)评《韩诗外传》十卷和黄从诫《韩诗外传旁注评林》。此外,明末唐琳所刻《韩诗外传》则是目前仅见的一部明人集评本《外传》,保存了张榜、孙鑛(1542—1613)、汪道昆(1525—1593)、李贽(1527—1602)、王世贞(1526—1590)及唐琳所作评语凡二百五十三条,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晚明学术界对《外传》一书的品评与鉴赏,对于此书的文学价值进行了精彩的揭橥。这些评点本的出现,标志着学术界对《外传》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层次,即文学研究的层面。宋人晁公武论《外传》“文辞清婉,有先秦风”,尚属对其文学价值的表面化体认,而至明人评点,则展现出蔚为大国的景象。实际上,在明代评点家的眼中,《外传》已不再是经部典籍,而是西汉散文的代表。唐琳评《外传》的第一条批语便是:“《国策》妙于峻洁,西汉宗之,余于《外传》益云。”^[14]显然是将《外传》视为宗法《战国策》“峻洁”风格的典范,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明代评点家的共识。

第三,明代学者深化了对《韩诗外传》性质的认识。在明代以前,已有部分文献涉及了《外传》的性

① “连续性”和“断裂状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种样态,系由余英时先生在《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中提出,余先生认为思想史的研究须二者并重。详见余英时著《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三联书店,2012:2)。事实上,这一对概念也完全适用于学术史的研究,《韩诗》盛于汉而亡于宋的发展轨辙恰好对应于这两个样态,故本文援以为证。

② 董道生卒年依虞万里先生之说,参见虞万里著《董道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文献》,2015第3期:149页)。

③ 《广川诗故》已佚,吴氏此文为辑佚本,共辑此书“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辑考相当完备。

质问题。最早者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该书“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1]2917}，但未就《外传》的性质进行论述。其后宋人欧阳修（1007—1072）《崇文总目叙释》谓《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15]，陈振孙（1179—1262）^①谓《外传》“盖多记杂说，不专解《诗》”^[16]，皆有语焉不详之嫌。至明人王世贞始明确揭出此书“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17]的本质^②，体现出历代学者探索《外传》性质的逐步深化。此说影响极大，四库馆臣据之将《外传》从传统的经部诗类正编移入经部附录^③，便是最直观的例证。

至于元明两代对《韩诗》佚著的关注，则相当匮乏，远不足与《韩诗外传》研究相埒。唯一涉及《韩诗》辑佚的研究是明季董斯张（1587—1628）的《补王伯厚〈诗考〉》^④，此文共辑录《诗考》漏辑的三家《诗》遗说19则，其中包含《韩诗》遗说13则。此外，尚有部分《诗》学论著对三家《诗》给予了部分关注，解诗时偶有使用《韩诗》之处，马昕对此进行过研究^⑤，可供参考。但总体而言，《韩诗》佚著在元明两代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则是一望可知的事实。

三、清代的《韩诗》研究

《韩诗》研究发展至清代，已迥异于宋元明三代的星星之火，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无论是《韩诗外传》研究，还是《韩诗》佚著研究，均实现了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标举的“典范”（paradigm）意义：“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8]清代《韩诗》研究的空前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韩诗外传》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笺注。元明虽有少数校刻《韩诗外传》的版本，却无一部注释性质的本子。直至清代，《外传》的注释才系统展

开，这当然与风靡于乾嘉学术界的校释古书之风有极大关系。孙海波曾指出：“清代治《外传》者，则有武进赵怀玉校本，新安周廷案注本，蕲水陈士珂疏证，三书并称善本。”^[19]“三书”即指赵怀玉（1747—1823）《校刻韩诗外传》、周廷案《韩诗外传校注》及陈士珂（？—1804）^⑥《韩诗外传疏证》。赵、周成书先后相属，在校勘与注释方面互有短长，伦明（1875—1944）对二本得失论之甚详^⑦，兹不赘言。吴棠（1813—1876）所刊《韩诗外传校注》虽题周廷案注，却附以赵怀玉校语，实为赵、周合刊本，故钱锺书（1910—1998）先生题为“赵怀玉校，周廷案注，吴棠望三益斋合刊”^[20]，此本因吸收了赵、周的有益成果，“故读《外传》者，当以望三益斋本为最善也”^[21]。陈士珂《韩诗外传疏证》也是对《外传》全文进行校勘的著作，但其工作重点则在辑录《外传》的“互见”文献，“以《外传》为纲，取诸书互见者，备录于左”^[22]，与赵、周重在校勘异文与训诂字词有别。以上数部注本，均是以《外传》全文为研究对象，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此外，清人尚有对《外传》部分条目进行校勘注释的作品，也值得重视。成就较高者为许瀚（1797—1866）《韩诗外传校议》及俞樾（1821—1907）《读韩诗外传》，涉及了《外传》的版本问题、字句校勘、体例特点等内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基础。此外，程金造（1908—1985）在研究《史记索隐》引书时曾指出：“《汉书·艺文志》列《韩诗外传》六卷，《隋书·经籍志》作十卷。今本亦十卷，然实非旧本，多所亡佚。”^[23]此言指出了《外传》文献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即佚文辑录，这也构成了清儒研究《外传》的一部分。屈守元谓：“赵怀玉《校注》有《补逸》三十余条，据《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一，云：‘《韩诗外传补逸》一卷，卢文弨辑，赵怀玉刊。’则此稿出于卢氏也。周廷案《校注》，据其姪宗杭跋，但有佚文三条，无足比数已。陈士珂《疏证》

① 陈振孙生卒年依何广棧《陈振孙生卒年新考》（《文献》2001年第1期），转引自李裕民《宋人生卒年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252）。

② 清人顾宗泰《读〈韩诗外传〉》谓：“韩婴所著《韩诗外传》皆论事以引《诗》，其说《诗》也微矣。引申触类，无不可以说《诗》，而《外传》不免附会也。”见顾宗泰著《月满楼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此说实系转化王世贞而来，亦可见王说影响之一斑。

③ 刘咸炘（1896—1932）在《旧书别录·韩诗外传》中敏锐地指出王世贞之说是四库馆臣置《外传》于经部附录的依据：“王世贞谓是书引经以断事，非引事以证经，《四库提要》因置之经部附录。”见黄曙辉编《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7）。但需要指出的是，先于《总目》成书的《初次进呈存目》并未引用王世贞之说，且遵循惯例，将《外传》一书列于“诗类”之首，与《总目》置于“诗类”附录截然不同。见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经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4）。可见对于《外传》的定性，四库馆臣曾做过颠覆性的改变。

④ （明）董斯张著《观景集》，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⑤ 见马昕著《三家〈诗〉研究在元明及清初的发展轨迹》（《国学》第一集，2014：85—119）。

⑥ 陈士珂生年待考，卒年则暂依刘嗣《陈沆年谱》所记嘉庆九年（1804）陈沆“祖父陈士珂亡故”之说，见刘嗣著《鄂东状元陈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9）。

⑦ 见伦明著《〈校刻韩诗外传〉提要》，《〈韩诗外传校注〉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

亦有《佚文》，条目少于卢、赵。”^[24]房瑞丽还列出了屈氏未及的两家辑本，即王仁俊（1866—1913）《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及姚东升《佚书拾存》^①。总而言之，清儒对《外传》传世文本的全面校释与《外传》佚文的充分辑录，代表《外传》研究已进入全新的阶段。

第二，对《韩诗》佚著进行了更加周全的辑录。从王应麟《诗考》开始，《韩诗》的辑佚均是涵摄在三家《诗》辑佚之中，并未发展成为独立的辑佚对象。但至清人手里，专门针对《韩诗》佚著进行辑录的现象已相当普遍，马昕曾专就乾嘉时期以宋绵初（1777年贡生）《韩诗内传徵》、臧庸（1767—1811）《韩诗遗说》为代表的六部《韩诗》辑本进行过细致的介绍^②。臧庸对《韩诗》辑佚尤其拿手，他在多次订补《韩诗遗说》之外^③，还就《诗考》进行过补辑^④，其中亦不乏涉及《韩诗》的条目。乾嘉之后仍有不少《韩诗》辑本问世，但与此前辑本多利用中土传世文献不同，这批辑本最大的特点便是引进了日藏汉籍所载《韩诗》遗说，陶方琦（1845—1884）《韩诗遗说补》、龙璋（1854—1918）《韩诗》、顾震福（1869—1935）《韩诗遗说考补》等等，都是利用这些新材料而成的新辑本。此外，清代不少大型辑佚丛书中也包含着《韩诗》佚著辑本，如王谟（约1731—1817）《汉魏遗书钞》辑有《韩诗内传》《韩诗翼要》，马国翰（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韩诗故》《韩诗内传》《韩诗章句》《韩诗说》《韩诗翼要》，黄奭（1809—1853）《黄氏逸书考》辑有《韩婴诗内传》。即便在统辑三家《诗》的辑本中，所辑《韩诗》条目的数量和质量也较《诗考》有了不少突破，如冯登府（1783—1841）《三家诗遗说》，陈寿祺（1771—1834）、陈乔枏（1809—1869）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等等，均以详赡的搜罗与精审的考证而著称，尤其是陈氏父子之书，得王先谦（1842—1918）“最为详洽”之誉^[25]，代表了清儒《韩诗》辑本的最高成就。

第三，对《韩诗》遗说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疏证。清人丰富多彩的《韩诗》辑本，为《韩诗》研究奠定了

重要的文本基础。二陈父子完备的《韩诗遗说考》问世之后，留给佚文辑录的余地已所剩无多，故《韩诗》研究改弦易辙，由对遗说的辑录转向疏证，这一转向在马国翰、陈乔枏等人辑录《韩诗》遗说时已初露端倪，如马氏《目耕帖》便常常对《韩诗》字义进行推求，陈氏按语也不乏考证文字，但汇集众说而成一书者，则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此书对包括《韩诗》在内的三家《诗》遗说进行了深入的疏通阐释，对《韩诗》训诂、题旨均有考证与发挥，标志着《韩诗》研究完成了由文本的外沿搜集进入内在研究的历程，在《韩诗》研究史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但因王先谦囿于今、古文经之别，故其解说《韩诗》亦有求之过深与师心自是之处，导致其解读常常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在20世纪层出不穷的地下文献出土以后，王先谦解诗的失效率已节节攀升，远非其执拗的三家《诗》立场所能救赎。此外，清儒对《韩诗》遗说的疏证，还表现在《毛诗》研究著述里。例如胡承珙（1776—1832）《毛诗后笺》、马瑞辰（1777—1853）《毛诗传笺通释》、徐璈（1779—1841）《诗经广诂》、陈奂（1786—1863）《诗毛氏传疏》均有多处探讨韩、毛异同的段落，其中便涉及了对《韩诗》异文遗说的考索，由于这些学者在训诂、音韵等方面均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故其对《韩诗》的考证也精见叠出。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在佚文辑录方面深受二陈父子之惠，在训诂方面则多引用胡、马诸家之说，足见前述学者在推动《韩诗》遗说考证方面的殊勋。王先谦谓其成书“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25]，这是实情，绝不可视为谦辞。

综上所述，清人的《韩诗》研究成就斐然，无论是《韩诗外传》校注，《韩诗》佚著辑录，还是《韩诗》遗说的考释阐发，均取得了陵轶前人的实绩。同时，他们的成就还为后续研究提供着强大的“示范”作用，例如清人善从“互见”文献的角度展开对《韩诗外传》的校注^⑤，这一方法在今天的学界已实现了预流；清人《韩诗》辑本所提供的种种辑佚线索，也为今天重新辑录《韩诗》提供了方向；清人对《韩诗》遗说的训诂考证，为今天更加深入地开掘该学派的

① 见房瑞丽作《清代三家《诗》研究》第六章第三节（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161—162页）。“玉函”原误作“玉涵”。

② 见马昕《清代乾嘉时期的《韩诗》辑佚学》（《国学》2016年第1期：387—422）。其所选六部《韩诗》辑本除了宋、臧之书，尚有沈清瑞（1758—1790）《韩诗故》、严可均（1764—1843）《韩诗辑编》、钱玫《韩诗内传并薛君章句考》、赵怀玉《韩诗外传补逸》。

③ 见马昕《臧庸〈韩诗遗说〉的成书、刊刻与订补》（《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六辑，2016：181—190）。

④ 见李寒光《臧庸〈诗考〉三种钞本考述》（《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六辑，2016：331—341）。

⑤ 对“互见”文献的研究，在最近十年间已相当风靡。其合理之处，实际上基于中国早期写本文化的一大特性，即存在“资源共享”的“谈资”，参见李零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2204）。廖见群师近年攻治的“说体”文献，亦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了新的园地，有关“说体”的最新论述，参见廖群作《“说体”：考察先秦叙事文本的新范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6—28，第007版）；另参见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6）。

学术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①。此类富于开创意义的研究,均系清人在《韩诗》研究中所取得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值得表彰。

四、现当代的《韩诗》研究

现当代的《韩诗》研究接续了清人开创的繁盛局面,并作了更深广的推拓。

在《韩诗外传》研究方面,现当代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继承清代学术路数的同时,还开拓了清人未加探索的领域,进而表现为继承与突破并重的特点。马鸿雁和白云娇均曾对20世纪以降的《外传》研究做过介绍,兹撮其要者,并连及近年学界研究成果,一并综述于此。^②

1. 在校注领域

大陆出现了许维遹(1902—1951)^③《韩诗外传集释》与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两部著作。许著系作者遗著,并未完成,但主要的版本异文已罗列得较为周备,虽然存在部分问题^④,终不失为较有价值的本子,故颇得学界之认可。屈著则广搜众本,精心校勘,详作笺证,并附版本题识、著录及评述资料、序跋辑录等内容,为《外传》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此书有部分校注存在掠美之嫌^⑤,则是美中不足之处。需着重指出的是,屈著有两种版本,均为巴蜀书社出版:一为1996年繁体直排的初印本,文字校对精审,很好地体现了该书的学术面貌;一为2012年重新排版的繁体横排本,此本之印刷错讹满纸,不堪卒读,几乎使原著面目全非。故仍

以选用初印本为佳。日本注释《外传》之作,则以伊东伦厚《韩诗外传校注》为代表,惜目前仅见前两卷^⑥,除了参考清儒成果,还对中国台湾及日本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裁酌,适可与中国大陆研究形成互补。吉田照子所撰《韩诗外传注释》对《外传》全文进行了校注,分卷发布在《福冈女子短大纪要》39—48号中,其体例为先列《外传》原文,后附日语译文,次就译文展开注释,次序井然。但其注释除了征引前人校勘记及注明章末所引《诗经》篇目外,并无太多发明。

2. 在“互见”研究领域

最值得重视的成果来自于日本学界,而吉田照子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吉田氏曾撰多篇论文,考察了《外传》与多部先秦两汉古籍的关联^⑦,这些论文大多在比较研究中,凸显《外传》的价值,新见迭出,谈言微中,对于《外传》与互见文献的对比研究的深入进行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日本学者丰嶋睦与中国台湾学者余崇生着重对《外传》与《荀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⑧,尤其是余氏之文以表格的形式将《外传》引用《荀子》的所有文段加以罗列,为此二书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方便法门,惟其文以日语写成,故国内学者鲜有提及。

3. 在思想研究领域

有些学者对《外传》的儒家思想——如礼乐思想^⑨、

① 有关训诂与思想间的关联,国内学者关注颇夥,较为透辟的阐释见〔日〕池田秀三著,石立善译:《经学在中国思想里的意义》(童岭主编:《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上海:中西书局,2017:45—51)。

② 参见马鸿雁《〈韩诗外传〉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③ 中华书局《韩诗外传集释·出版说明》误定许维遹之生年为1905,陈锦春以浦江清(1904—1957)《许维遹先生辞世前后》为据加以辨误,定许氏生于1902年,见陈锦春:《〈韩诗外传集释〉整理失误辨析》(载于《诗经研究丛刊》第22辑,2012:127)。其说可从。

④ 王迈曾对许著进行过补证,将其书之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疏于制度,误断字义”“事义从同,文辞各异”“疑衍非衍,疑阙非阙”“连语偏用,义同全词”“文义未审,误断句读”“原系两事,强合为一”。参见王迈著《许著〈韩诗外传集释〉补证举例》(《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143—146)。

⑤ 萧旭曾指出:“屈守元使用赵善诒、许维遹说,多无说明。”见萧旭著《〈韩诗外传〉解诂》(《文史》,2017年第4期:6)。

⑥ 见〔日〕伊东伦厚《韩诗外传校注(一)》(《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6卷第1号,1977:1—66)。《韩诗外传校注(二)》(《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6卷第2号,1978:1—48)。

⑦ 参看吉田照子下列文章:《韩诗外传と説苑》(《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57号,1999:53—59);《韩诗外传と列女传》(《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59号,2001:125—140);《韩诗外传と孔子家语》(《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60号,2002:45—58);《韩诗外传と荀子:引诗的特色》(《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61号,2003:45—59);《韩诗外传と孟子》(《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63号,2004:63—73);《韩诗外传と吕氏春秋》(《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66号,2005:61—74)。

⑧ 见〔日〕丰嶋睦《韩婴思想管见——韩诗外传引用荀子句を中心として》(《支那学研究》第33号,1968:50—58);余崇生《韩诗外传研究ノート(一):荀子引用文との対照表》(《待兼山论丛》第17号,1983:21—36)。

⑨ 吉田照子对《外传》的礼乐思想进行了深邃的探讨,既讨论了“礼”与“生”“诚”“时”“治”的关联——参见吉田照子著《韩诗外传の礼》(《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51号,1996:119—133);又认为《外传》引《诗》体现了礼乐文化的绝对性,并以存在论的视角考察了儒家道德视域中的礼——参见吉田照子著《韩诗外传の詩と礼と楽》(《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53号,1997:81—96)。

易学思想^①、孝思想^②、教育思想^③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有些学者则对《外传》所包含的儒家之外的思想进行了探索,如徐复观(1903—1982)指出《外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却在处世上,也受到道家的若干影响”^[26],金春峰则认为《外传》的“法家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7],而刘毓庆、郭万金又认为“从《韩诗外传》中,似乎又可以看到《韩诗》所沾有的阴阳家之气”^[28]。上述研究均能够挖掘《外传》在儒家之外的思想内容,对于深入认识《外传》的性质问题颇有意义。

4. 在版本研究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和刻本《外传》的研究。《韩诗外传》最晚至唐代已传入日本,最直观的证据是藤原佐世(847—898)撰于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对其进行著录^④,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和刻本《外传》。例如岩井直子曾以唐本为基础,对《外传》的书志性质开展了研究^⑤,高桥良政则分别就胜村本《外传》和宝历九年(1759)星文堂刻本《外传》进行介绍^⑥,对于了解日本的《外传》版本颇有助益。(5)《韩诗外传》作为汉代典籍,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也有较大的价值,故有部分学者对《外传》的语言学价值加以研究,成果虽然不多,却有开风气之贡献。例如日本学者橘纯信通过《韩诗》异文,分析了其中所反映出的方言特征^⑦,部分异文的来源便出自《韩诗外传》章末所引《韩诗经》。此文发表于1983年,可见日本学者在发掘《外传》多元价值方面的敏锐嗅觉。

在《韩诗》佚著研究方面,虽然成果不像《外传》研究那么丰富,但仍呈现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兹就四方面进行介绍。①在《韩诗》佚著作者方面,可以王承略先生对《韩诗翼要》作者的考证为代表^⑧,由于不同文献著录《翼要》作者有侯苞、侯包、侯芭之歧,显然存在正名之必要,王先生爬梳载籍,综合史料,考定作“芭”者为是,澄清了《韩诗翼要》的作者问题。②在《韩诗》具体佚著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是杨树达(1885—1956)对《韩诗内传》存佚情况的论述^⑨以及马昕对《韩诗章句》成书、流传及亡佚问题的考证^⑩,这代表《韩诗》佚著的研究已进入专书探讨的层面。杨文认为今本《韩诗外传》卷一至四实为《韩诗内传》,故发展出《韩诗内传》并未亡佚的结论。马文认为《韩诗章句》由薛方丘、薛汉父子共同撰成,“在南北朝,《薛君章句》已被附入《韩诗》经传之中,散入各篇”,“最终在南宋初年至孝宗淳熙之间随《韩诗》文本一同亡佚”。③对《韩诗》佚著的阐释特色进行解读的成果也时有出现。王承略先生认为《韩诗》“在说经上侧重兴发”,“‘兴发’既是孔门论《诗》理论的应用,又很符合大众的阅读趣味,就成了《韩诗》在品格上不同于《鲁》《齐》而又颇能吸引研习者的地方”^[29]。曹建国、张莉莉则对《韩诗》以讖纬解《诗》的特性作了详细的考索,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揭示。^[30]④对《韩诗》遗说的解诗价值进行关注与考察,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关注考察,既有对《韩诗》遗说予

① 吉田照子曾对《外传》的易学思想加以概括,就“生命与使命”“运命与时”“礼”及“阴阳二元论”展开集中论述,认为韩婴在上述四方面的阐释,在易学思想史和儒学思想史中均具备开创意义,参见吉田照子著《韓詩外傳の易思想》(《福冈女子短大纪要》第49号,1995:105—118);连劭名对《外传》与《周易》相通的思想有更加详细的论述,认为二书“在强调行有所止、卑己虚怀、简朴平夷、迁善改过、推己及人、损盈益谦、困用贤人、穷变通达、恒守其德、慎始有终、反求诸己、颐养安命的思想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参见连劭名著《〈韩诗外传〉与〈周易〉》(《周易研究》,2012年第4期:13—23)。

② 张仁玺曾就《外传》对先秦儒家孝道观的重视展开论述,指出“韩婴发现了忠孝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韩婴主张通过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行孝,兴办学校对民众进行孝伦理教育等措施培养社会成员对孝道的认同和实践”,参见张仁玺著《〈韩诗外传〉中的孝道观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147—151)。

③ 吴中齐所撰《韩婴的教育思想》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探讨《外传》教育论的成果,对韩婴富于时代特色的教化论和德育论进行了探讨,并附加讨论了《外传》的人性论和养生论,参见吴中齐著《韩婴的教育思想》(《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47—51);王慧则着重探析了《外传》对教育的作用、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学习的意义和过程、家庭教育等问题的论述,与吴文可形成互补,参见王慧著《韩婴教育思想概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54—56);日本学者斋木哲郎则以韩婴与诸侯王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外传》的教育论,参见斋木哲郎著《韓嬰と諸侯王——韓詩外傳の教育論》(《中国哲学》第28号,1999:1—33)。

④ 参见〔日〕藤原佐世撰,〔日〕矢岛玄亮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42)。

⑤ 参见〔日〕岩井直子《韓詩外傳の書誌的考察——唐本をもとに》(《汉籍》12号,2004:1—10)。

⑥ 参见〔日〕高桥良政《和刻本韓詩外傳の書誌的考察——勝村本について》(《斯文会》112号,2004:27—35);《韓詩外傳の書誌的考察——寶曆9年星文堂刻本について》(《櫻文论丛》第66号,2006:103—119)。星文堂刻本亦曾得到王晓平的注意,参见王晓平著《日本诗经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39—142)。

⑦ 参见〔日〕橘纯信,《韓詩異文の反映する方言的特徴》(《汉学研究》第20号,1983:137—150)。

⑧ 参见王承略:《侯苞、侯包、侯芭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69)。

⑨ 参见杨树达:《〈韩诗内传〉未亡说》,见其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17—218)。

⑩ 参见马昕:《〈韩诗薛君章句〉成书、流传及亡佚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69—75)。

以认可的,如俞艳庭曾多次讨论过《韩诗》遗说的内涵及影响^①;也有对《韩诗》遗说提出质疑的,如王长华先生在考察《鲁颂》产生时代时,便对《韩诗章句》所主奚斯作《鲁颂》说进行了否定,并推测“《鲁颂》四篇作品都产生于僖公时代,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初中叶之交”^[31]。这些解读,均为深入探讨《韩诗》遗说的解诗价值奠定了基础。

此外,现当代的《韩诗》研究还包括就整个学派的相关内容展开调查的成果。这些内容或涉及《韩诗》学派的学者考证,或涉及学术史与政治的关联问题,较为零散,此处便不再赘述了。

【参 考 文 献】

- [1] 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卷三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9.
-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0—41.
-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5.
- [5]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八“韩婴诗”条[M].北京:中华书局,2005:313.
- [6]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附录一[M].成都:巴蜀书社,1996:934.
- [7] 胡麐善.新城伯子文集:韩诗外传校注序[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4.
- [8] 王应麟.经部·诗类·诗考[M]//江庆构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9] 王应麟.诗考语略序[M]//四明文献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45.
- [10] 马听.乾嘉学者对王应麟《诗考》的校、注、补、正[M].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六辑,2015:25—46.
- [11] 吴国武.董道《广川诗故》辑考[J].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7辑,2008.
- [12] 黄丕烈.诗外传十卷题识[M]//黄丕烈撰,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29.
- [13]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
- [14] 韩婴撰,唐琳校刻.韩诗外传[M].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天启间刻本:卷一.
- [15]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二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1:1881.
- [16]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5.
- [17] 王世贞.读《韩诗外传》[M]//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5273—7374.
- [18]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
- [19] 孙海波.《韩诗外传校议》提要[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448.
- [20] 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第10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29.
- [21] 江瀚.《韩诗外传校注》提要[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447.
- [22] 伦明.《韩诗外传疏证》提要[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446.
- [23] 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M].北京:中华书局,1998:27.
- [24] 屈守元.韩诗外传佚文[M]//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96:887—888.
- [25] 王先谦撰,王承略,陈锦春等校点.诗三家义集疏:序列[M]//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藏精华编:第3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26] 徐复观.《韩诗外传》的研究[M]//两汉思想史:第三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5.
- [27]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9.
- [28] 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卷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7.
- [29] 王承略.四家《诗》在汉代不同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M]//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3—54.
- [30] 曹建国,张莉莉.《韩诗》与谶纬关系新考[J].武汉大学学报,2015(6):59—67.
- [31] 王长华.《鲁颂》产生时代新考[M]//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89—95.

(责任编辑:程晓芝)

(下转第81页)

① 例如俞氏曾对朱熹《诗集传》解说《郑风·褰裳》“男女相答”的根源做了追溯,认定朱子立说的依据为《韩诗》“溱与洧,说人也”之语,参见俞氏著《褰裳》朱熹“男女相答”说探源》《《理论学刊》,2005年第10期:107—109。此文后收于俞氏著《两汉三家〈诗〉学史纲》附录三,328—33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俞氏则着重对《周南·汉广》的《韩诗》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将其与《溱洧》进行并列研究,得出“在《韩诗》家看来,汉之游女实系汉水之滨的女巫,《汉广》诗反映了江汉合流之地的上古巫风”的结论,参见俞氏著《〈汉广〉三家说探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125—128)。